

# 草根传媒文化

##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视觉文化景观

庞 弘<sup>\*</sup>

**摘要**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草根传媒文化已迅速崛起，并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文化景观。在传播工具、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模式等方面，草根传媒文化都体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内涵和特质，从而对主流媒介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同时，在草根传媒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呼应、彼此建构的密切关联。一方面，社会变迁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的全方位转变，不仅造成了草根传媒文化的异军突起，而且促使其呈现诸多别具一格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草根传媒文化也衍生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从而强有力地作用于主体的精神与情感维度，并进一步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

**关键词** 草根传媒文化 视觉文化 社会变迁 中国经验

**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Chinese society ,grassroots media culture has sprung up and produced the refreshing visual spectacle. Grassroots media culture unfolds distinctive connotations and features on communication tool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communication subjects ,communication con-

---

<sup>\*</sup> 庞弘，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艺术理论以及视觉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视觉文化研究”（12JZD0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和研究”（15ZDB085），四川师范大学一般科研启动项目“社会变迁视域下的草根传媒文化研究”。

tents and communication modes , etc. , and produces astonishing impacts on the operations of mainstream media culture. Simultaneously , there are close connections of mutual response and construction between grassroots media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 social transformation leads to the comprehensive alternation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 economy , culture and technology , not only causes the appearance of grassroots media culture , but also makes it presenting various unique patterns and styles of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hand , grassroots media culture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 series of thought-provoking Chinese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As a result , it affects strongly on the ment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 of visual subjects , and thus promot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grassroots media culture visual culture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nese experience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意义上统一、稳定、井然有序的文化形态渐行渐远,相反,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民间文化等既相互抗衡,又彼此渗透,共同形塑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动态格局。<sup>①</sup>在众多异质文化成分“多声部”对话的总体进程中,“草根传媒文化”(grassroots media culture)无疑已异军突起并成长为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它植根于互联网这一新兴的技术形态中,随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演进而日趋成熟,并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在2008年震撼世界的“5·12”大地震中,高达87.4%的受众选择通过互联网来获取与灾情有关的报道,其受众比例不仅将报纸、广播、杂志等远远甩在身后,甚至还超过了电视这一长期以来备受推崇与认可的主导媒体形态的受众比例。<sup>②</sup>这样的事实充分印证草根传媒文化在当下的深入人心。

谁也无法否认,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草根传媒文化不仅鲜明地改写了人们认知与感受的既有图谱,而且也向每一位当代媒介文化的亲历者提出

① 阎嘉 《多元文化与汉语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5期。

②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09年7月发布的《社会大事件与网络媒体影响力研究》,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bzg/200912/P020120709345307778361.pdf>。

了尖锐的问题。具体而言,草根传媒文化所体现的是怎样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与传播路径?草根传媒文化对个体人的视觉经验和文化意识起到了怎样的引导与塑造作用?公民对草根传媒文化所持有的是怎样的情感态度、解码方式以及价值预期?在草根传媒文化的发展与演进中,又将暴露怎样的危机、隐患和悖谬?如何对上述问题加以准确的权衡、估量与评判,显然已成了研究者在针对当前传媒生态乃至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考察中不容回避的最基本环节。

## 一 何谓草根传媒文化

要想廓清草根传媒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属性,首先必须对“草根”(grassroots)的词源及其背景有所把握。对于我们而言,草根始终是一个熟悉而又多少有些陌生的词语。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往往融会于最庸常的生活之流而令人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之所以陌生,则在于这个词所具备的高度普适性使它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强大能指,从而阻碍了人们对其意涵的相对明晰的阐释。“草根”一词的缘起可追溯至 19 世纪美国的“淘金热”,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凡山脉草根茂盛处便一定藏有金矿。而在今天,按照最普遍的理解,草根主要在以下两个领域得到了频繁的使用:第一,在社会学领域,草根通常代表那些被政府或当权者所漠视乃至放逐的非主流群体,它们大多携带着某种与主流和精英相抵触的反叛性潜质。当前流行的“草根阶层”“草根组织”“草根运动”“草根舆论”“草根抗争”等词语便明确体现了这种与正统规范相疏离的边缘性立场。<sup>①</sup>第二,在人类学或民俗学领域,草根更多指向了某种文化心理层面的传承与延续,指向了那些生长于民间的传统、风尚、习俗、情趣、仪式、禁忌,它们如同杂草一般不登大雅之堂,却又绵延不绝、蕴藏着惊人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草根固然拥有质朴、生动、坦率、真诚等先天的优越性,但同样也保留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藏污纳垢”等难以避免的弊端。然而,无论如何,在人们日渐失去信仰与操守的当代生活中,

<sup>①</sup> 这样的边缘性立场一方面对既定的原则和秩序产生了冲击,一方面也极有可能遭受主导意识形态或商业文化的封锁、支配乃至收编,并最终呈现更加含混、驳杂、暧昧的身份定位。

它必将有助于达成对个体精神家园的想象、追溯以及重构。<sup>①</sup>

不过,当草根与“传媒”(media)概念结合在一起时,它将更多涉及一种媒介层面的创造性更新,以及由此引发的信息方式的大幅度转变,因而也必将获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表现形态和基本属性。所谓“草根传媒文化”,既不同于社会学研究中的底层与边缘文化,亦不同于人类学视域内的民俗或民间文化,它所指的是广大民众基于信息与技术革命而构筑的别具一格的文化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可以借助俯拾即是的新兴技术设备打造属于自己的传播平台,并主要通过互联网来接收、加工、制作、上传、分享以视觉形象为主的相关信息资源。不难见出,草根传媒文化的主要参照对象并非处于政治中心的统治阶级或决策者,也绝不是处于文化中心的知识精英或思想领袖,而是长久以来蔚为大观的主流传媒文化,同时,必须注意到,草根传媒文化之所以能体现若干难以替代的本体论特征,其关键应取决于如下几个枢纽或核心要素。

一是传播工具。主流传媒文化借助专业化的传播工具,遵循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规范化的、按部就班的信息生产。草根传媒文化的形成则依赖所谓的“草根媒体”(grassroots media),<sup>②</sup>即个人电脑、可拍摄手机、数码相机等便携式的传播工具,其突出特点在于成本低廉、操作便捷、普及性强,有助于跨越时空界限而自由、灵活、随意地采集相关信息。

二是传播途径。主流传媒文化依托报刊、电视、电影、广播等传统媒介而广为传播。草根传媒文化则大多以互联网为平台,在主页、博客、微博以及各色社交网站中得到了醒目的表现。网络空间与生俱来的技术性特质,无疑打破了信息交流中既有的原则和惯例,创造了进一步演绎与开拓的空间。

三是传播主体。主流传媒文化的传播主体是少数专业人士,他们的行为通常被一个居高临下的媒体机构所统摄、掌控和操纵。草根传媒文化的

① 如高小康便指出,南粤草根文化通过黄飞鸿、舞狮舞龙、茶楼、宗庙、祠堂、祭祀、风水、客家山歌等意味深长的符码得以显现,不仅流露了鲜明的“异”的审美趣味,而且极大地满足了政治夹缝中的香港人守望传统并追寻身份认同的内在诉求。上述见解点明了草根文化在肤浅、鄙俗的表象下所包含的难以穷尽的魅力。参见高小康《霓虹灯下的草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都市民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 在传播学研究中,草根媒体也常常被称为“自媒体”(we media)、“私媒体”(private media)、“独立媒体”(independent media)、“公民媒体”(citizen media)、“全民媒体”(people media)、“参与式媒体”(participatory media),等等。

传播主体则摇身一变,成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于是,美国传播学家吉摩尔 (Dan Gillmor) 的“人人都能生产新闻”<sup>①</sup>的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同时,饶有趣味的是,在草根传媒文化中,一个人可以同时扮演制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多重角色,而传统意义上“生产—流通—消费”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愈发模糊。

四是传播内容。凯尔纳曾把当代媒介文化指认为“一种图像文化”。<sup>②</sup>具体到草根传媒文化中,琳琅满目、错综复杂的视觉资源占据了压倒性的比重,即使是以纯文字为主的草根报道,倘若没有附上形形色色的视频或图片,其影响力和说服力也就必然大打折扣。当然,就主流传媒文化而言,形象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不可或缺的维度,但应当看到,在草根传媒的视觉表现中,总是凝聚着诸多个性化的叙事方式、修辞技法和话语体系,它们所带来的,自然是更加细腻、微妙的情感取向与价值关怀。

五是传播模式及其精神取向。如果说,主流传媒文化贯彻了一种同质化、中心化、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那么,草根传媒文化则昭示了一种混杂化、离心化、自下而上的新的传播格局。由此而连带引发的,势必是关涉到文化心态和思维结构的更深层次的变化,包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数走向复数,从独白走向对话,从宏大叙事走向个体叙事,从深度走向平面,从严肃走向诙谐,从共识走向分歧,从精英主义走向平民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sup>③</sup>

可以说,以上几个方面不仅大致勾勒了草根传媒文化的总体轮廓,还在一定程度上标明了草根传媒文化相对于主流传媒文化的独特优势。草根传媒所提供的是主流媒介之外看待对象的另一种视角,而在主流媒体基于种种原因而滞后甚至是缺席时,草根传媒恰恰能够给事件以尽可能真切的还原和补充。正因为如此,自 2006 年左右开始,由广大受众自主生成相关

① (美) 丹·吉摩尔 《草根媒体》,陈建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 34 页。

②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 9 页。

③ 有学者曾援引“庙堂”和“江湖”来划分主流传媒文化和草根传媒文化。其中作为“庙堂”的主流传媒文化具有中心性、封闭性、权威性、统合性的特征,而作为“江湖”的草根传媒文化则表现了开放性、分权性、共享性、容错性、戏谑性等鲜明、生动的品质。这样的观点以极具本土化的姿态,凸显了草根传媒文化为当代中国社会所注入的某些新的精神气质。彭兰 《文化融合: 三网融合中的“瓶颈”》,唐绪军主编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 243~247 页。

内容的“UGC 模式”(user generated content)便已经在新闻业渐入佳境。<sup>①</sup>一个更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2009年轰动一时的“央视大火案”,面对该突发事件,作为权威传媒机构的中央电视台选择不予播报,而在第一时间拿起手机或相机,对事故加以“现场直播”的,则是成百上千的围观群众。在很多学者眼中,该事件恰恰标志着草根传媒文化对传统电视新闻的挑战、冲击乃至超越。<sup>②</sup>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几点还进一步限定了草根传媒文化的双重面相。其中狭义的、最典型的草根传媒文化是直接由公民原创的影像或资讯,当前流行的拍客文化便是其最突出的代表。然而,草根传媒文化又是一种以共享和分有为标志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传统意义上的原创性遭到了较之机械复制时代更猛烈的削弱。因此,各类来源于报刊、电影、电视等主流媒介的信息,一旦流入网络,并经过人们的点击、评论、转发乃至“二度加工”,便被归入一个更加广义的草根传媒文化的范围之内。

## 二 作为社会变迁表征的草根传媒文化

无须赘言,任何媒介文化都并非单一、孤立、铁板一块的存在,而总是呈现不断调节、补充、更替的开放状态,总是处于同外在现实相互对话、彼此参照的动态过程中。于是,在今天,日常生活一方面已经为媒介所浸透,“并越来越多地围绕一种媒介化的过程而得以构造”;<sup>③</sup>另一方面,媒介也作为“一种社会延伸形式”<sup>④</sup>而发挥作用,它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植根于更加丰富、宽广的社会文化层面。由此可见,草根传媒文化在当前的星火燎原绝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恰恰是中国社会全方位、多层面的激烈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并催化了草根传媒文化的凸显与广泛流传。这种变迁既包括经济、制度、科技、文化等宏观层面的转换,又牵涉

① 黄炜、唐晓芬《全媒体环境下电视价值链创新》,胡正荣主编《新媒体前沿(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7页。

② 邱林川、陈韬文《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6页。

③ Brian Longhurst, *Cultural Change and Ordinary Life*,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④ (澳)戴维·贺莫斯《媒介、科技与社会:传播理论的面向》,赵伟奴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第30页。

到个体生活方式和人格结构的潜移默化的调整。总的说来,社会变迁对草根传媒文化的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变迁加速了都市的发展,从而为草根传媒文化的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都市并非刻板、无生气的人造物,而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能动场域,它一方面被人们观察、感受和塑造,另一方面又编织了历史、空间和社会之间的复杂网络,建构了主体的知觉、意识乃至整个存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鲜明特质,便在于迅疾、猛烈、义无反顾的都市化进程。<sup>①</sup>都市化不仅意味着人口资源向城市的高度集中,以及都市文明的繁荣和城市建设的加快,还意味着城市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已经异常深入地内化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就草根传媒文化而言,都市固然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坚实保障,并培养了一大批具备基本媒介素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然而,更重要的是,都市自身矛盾交织的独特品格,也为草根传媒文化的演绎做出了恰如其分的铺垫。众所周知,都市缔造了“创造性,进步性以及新的道德秩序的空间”,<sup>②</sup>为公民带来了空前的便利和福祉;但同时,都市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拥挤、噪声、污染、贫困、暴动,导致了疯狂、焦躁、混乱、迷茫、紧张等畸形的情绪体验。<sup>③</sup>因此,都市既不纯粹是一个自由、民主、解放的乌托邦,也不全然是一个丑陋、肮脏、堕落,让人看不到丝毫希望的炼狱,它始终呈现不断生长、演化、分裂的可能性面貌。这种斑驳多样、难以穷尽的可能性,无疑成了草根传媒最贴切不过的表现素材和书写对象。归根结蒂,都市化的如火如荼促成了草根传媒文化的成长与壮大,而草根媒介也必将绘制出都市此起彼伏的生动图谱,必将使都市以具体、可感的姿态,为更多人认知、体味和领悟。

其次,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生产方式的沿革与更替,这些变化为草根传媒文化的形成带来了适宜的土壤。在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看来,从“福特主义”(Fordism)向“后福特主义”(Post-

① 据相关调查统计,截至 2013 年底,我国各级城镇总辖区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城镇常住人口已达到 73111 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 53.73%,而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城镇化比例将达到 60% 甚至更高。参见汪光焘主编《中国城市状况报告: 2014 / 2015》,中国城市出版社,2014,第 15 页。

② Chris Barker, ed.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 204.

③ 庞德(Ezra Pound)那句“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黑色枝条上许多花瓣”,便是关于城市所造成的疏离感和创伤体验的一个充满诗意的注脚。

Fordism) 的过渡已然成了现今最引人瞩目的社会文化事件。其中,福特主义来源于大工业背景下福特汽车公司所奠定的专业化生产程序,它以尽可能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为旨归,崇尚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严格、周密的分工,以及生产者的无限权威。后福特主义则诞生于福特主义日渐式微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所讲求的不再是统一、稳固、庞大,而是跨地域的协作,大范围的分配与定制,以及对消费者选择的关注,从而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新颖、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sup>①</sup>突出了一种充溢着“不确定感”的全新的时空体验。诚然,在执着追寻现代化梦想的中国社会,福特主义依然是不容非议的绝对主导(诸如富士康一类的“血汗工厂”便对此做出了富有戏剧性的诠释),毫无疑问,伴随全球化这一难以抗拒的总体趋势,中国同样也慢慢显露了某些后福特主义的征兆与端倪。<sup>②</sup> 上述状况在当前的媒介文化中得到了清晰、生动的反映。如果说,主流传媒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同福特主义相对接,即强调大规模、标准化、集中化的信息生产,并携带着直白、明确的功利目标,<sup>③</sup>那么,草根传媒文化则更多顺应了后福特主义的精神取向,它所青睐的是一种灵活、随意、个性化的生产与传播,因而也迎合了“分众时代”多元的审美趣味和价值预期。一言以蔽之,生产方式的当下变革从物质、精神、文化等多个向度确立了草根传媒文化的合法性,而草根传媒文化又反过来推动了这种变革的层层深入和逐步扩张。

再次,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无可避免地裹挟着技术层面的进步与突破,从而为草根传媒文化的继续生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技术,始终是一种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的存在。按照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观点,技术绝不是个体为达成特定目标而采取的辅助性措施,绝不是一种被动的、无生气的、外在的点缀和附庸,相反,自神话时代以来,它便引导着人们

①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220页。

② 相关内容可参见赖土发《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

③ 如美国传播学家戈瑞伯尔(Doris A. Graber)便认为,主流传媒更多扮演了政府传声筒的角色,从而发挥了营造政治氛围,灌输意识形态,培育社会运动和利益组织等功效。参见(美)道瑞斯·A. 戈瑞伯尔《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37~148页。

“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sup>①</sup>进而真切地建构了个体的思考和行动，建构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在转型阶段的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经济建设的加快，以及愈发开放的市场竞争，共同带动了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同时，当前的技术产品又明显体现高度的普适性和极强的亲和力，体现电子化、微观化、精细化、人性化、动态化等鲜明的品质。这样的局面不仅为草根传媒文化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保障和支撑，还促使这一文化形态顺利融入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是手机的升级换代。美国学者莱文森 (Paul Levinson) 坚信，技术拥有一种补偿性的潜能，它绝非居高临下地强加于人，而总是基于主体的具体需求，不断地调整、改善、更新。他指出，在传统意义上，人类的走路（在空间中移动）与说话（同他人交流）的功能是彼此分离的，正是手机的发明真正将两种功能黏合在一起，将它的使用者“从家宅和办公室解放出来，送进大千世界的希望之乡里去”。<sup>②</sup>由此出发，带有摄像头的新一代手机的出现，则再次将言谈、行走和影像采集的功能融为一体，在它的帮助下，人们在游走、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同时，能够自由、灵活、随心所欲地截取并保存眼前一闪而过的视觉片断。可以想见，这种技术装置的改进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草根传媒文化既有的形象体系，而且消解了主流传媒文化中单一、同质的效果预期，引发了诸多不同于以往的、即时的、生动的、“非线性”的视觉体验，并允诺了某种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新兴媒介景观。

复次，当下社会变迁的最醒目标志之一，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互联网的高歌猛进，草根传媒文化也借此而获得了赖以维系的支柱和充分的延展。具体说来，在现今的中国社会，网络已取代报刊和电视新闻而成了人们了解世界的最主要途径，同时，移动互联业务的欣欣向荣，又再次为网络效力的提升推波助澜。<sup>③</sup>互联网的广阔涵盖面和强大包容性，无疑带给了草根传媒文化无可限量的平台和演绎空间，但必须看到，网络又不只是一种信

①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 21 页。

② (美) 保罗·莱文森 《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 9 页。

③ 据相关调查统计，截至 2014 年底，中国网民人数为 6.49 亿，互联网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 47.9%。中国手机网民人数为 5.57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者所占比例已高达 85.8%。从总体上看，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对互联网表现积极态度。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于 2015 年 1 月的《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j/hlwzbg/201502/P020150203551802054676.pdf>。

息的载体或容器，它所具备的种种独特属性，不可阻遏地改变了既有的交流模式，进而使草根传媒文化呈现一系列迥异于主流传媒文化的意涵和价值取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对受众的解放作用。在传统意义上，媒体往往扮演着绝对掌控者的角色，而受众则无非是籍籍无名的“沉默的大多数”，即使在真人秀这类更加开放的视觉文本中，也依然有一个机构“制定了受众参与媒体生产的‘游戏规则’”。<sup>①</sup>而在草根传媒文化的表意实践中，网络空间的多媒体性、虚拟性、匿名性和未完成性，则有效保证了个体选择的能动性以及公众参与的高度自由，不仅能推动人们围绕特定议题各抒己见，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媒介的一种民主化形式”。<sup>②</sup>此外，究其实质，网络文化还是一种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谓的“真实的虚拟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它虽然脱胎于电子符码的虚拟世界，却有能力以象征的方式指涉并作用于个体的精神维度，进而实实在在地影响人们的情绪、态度乃至同外在现实的想象性联系。不难想见，这种真实和虚拟的交错杂糅必将在草根传媒文化中得到更加耐人寻味的演绎与彰显。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社会变迁还造成了公民心理状态的变化，进而为草根传媒文化的凸显做出了精神层面的准备与铺垫。主要表现有二：第一，当前中国的社会形态已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同质的超稳定结构走向多元、异质的动态化格局。上述局面促成了主体身份意识的觉醒和表达欲望的增强，使人们热衷于利用草根传媒文化的便利平台，尽情书写自己的经验、感受和见解。第二，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的急剧转型，在带来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种失序和不平衡现象的纷至沓来，如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冲突严重、官民矛盾加剧，等等。以上因素交互作用，引发了抑郁、迷惘、困顿、愤恨、惶恐等矛盾交织的情绪体验，这些复杂情绪投射到草根传媒文化中，自然也衍生出了斑斓驳杂的话语形态和媒介景观。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消费主义对群体心态及其媒介话语的深刻影响。在市场经济甚嚣尘上的当代中国，消费已愈发取代政治而成了衡量个体价值的根本尺度，成了指引人行动的最重要参照。同时，绝大多数草根传媒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者都属于20~29岁、大专

① （英）格雷姆·伯顿 《媒体与社会：批评的视角》，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第13页。

② （澳）格雷姆·特纳 《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页。

学历以上的年轻人。<sup>①</sup> 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积淀、独立意识和社会关怀,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却时常只能在大城市苦苦支撑,无力通过购房、买车等消费行为来谋求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他们不仅沦为了鲍曼 (Zygmunt Bauman) 所谓的“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sup>②</sup>的消费者,而且也时刻受困于一种内在的虚无,一种精神层面的挫败、屈辱与创伤。这样的尴尬境遇自然在草根传媒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画。如当前铺天盖地的“屌丝叙事”,便影射了青年一代被消费主义疏离和剥夺之后所感受到的彷徨、无奈与创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我否定、自我妥协、自我嘲弄的犬儒主义的人格特征。<sup>③</sup> 如此一来,草根传媒文化也就同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对抗性的草根产生了某些关联乃至同构。

综上所述,社会变迁带来了都市空间、生产方式、技术手段、信息传播、个体心理等多方面的意味深长的转变,这些变化既推动了草根传媒文化在当前传播格局中的脱颖而出,也共同作用,令其呈现众多别具一格的内涵、品质和特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草根传媒文化才一方面区别于大众文化、先锋艺术、民俗风情等既有的文化样态,另一方面又与上述文化产生了诸多重叠、交汇、冲突,并逐步构筑了一个充斥着强大张力和丰富可能性的“合力之场”。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转型期中的汹涌澎湃的巨浪中,草根传媒文化必将得到更加集中而深切的关注、开掘与探究。

### 三 中国草根传媒文化的独特问题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草根传媒文化现已成为了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媒介文化现象。如有学者便观察到,在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中,以博客、Twitter、YouTube 视频网站、MSN 个人空间、手机短信等为代表的草根媒体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sup>④</sup> 但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草根传媒文化在中国社会“转折”与“巨变”的特定背景下形成和不断扩张,

①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于 2012 年 3 月的《2011 年中国网民网络视频应用研究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bg/201205/P020120709345259404875.pdf>。

② (英)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 仇子明等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第 85 页。

③ 林品《从网络亚文化到共用能指——“屌丝”文化批判》,《文艺研究》2013 年第 10 期。

④ 王珍《从奥巴马当选看“草根媒体”的崛起》,《新闻大学》2009 年第 3 期。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各种情状、境遇乃至困厄都不同程度上通过它而得以具体化和彰显。于是，草根传媒文化也就适时地充当了一面镜子，凝聚并折射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在地性色彩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

中国草根传媒文化的独特问题大致关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草根传媒文化的形象谱系及其蕴含的情感逻辑。在针对任何文化形态的考察中，形象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核心命题，它不仅携带着丰富的、第一手的视觉信息，还可能塑造若干具有普适性和代表性的典型或范例，继而“在新的生存层面上建立了某些人格”。<sup>①</sup>无可否认，草根传媒文化所涵盖的是较之从前远为驳杂、多样的形象体系，而在草根传媒文化自成一格的视觉表达中，上述形象又呈现了一些值得玩味的品格和特质。如果说，在前网络时代的中国，形象更多地与革命、政治、国家等宏大命题水乳交融，更多担负着宣传或教化的庄严使命，那么，草根传媒文化则与人们更加血肉鲜活、更具私密性的情感体验建立起了难以割裂的紧密关联。具体说来，依托互联网这一即时、迅捷、一呼百应的平台，草根传媒形象强烈地触动了普通人在社会变迁中所共有的经验和感受，从而同他们产生了情感上的呼应、沟通与契合。在此基础上，公民在当下情境的特定情感状态，又驱使他们不断将目光投向某些特殊的形象类型，并不断将这些类型从漫无边际的网络空间中抽离出来，进而形构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冲击力的全新的形象类型学。由此可见，在草根传媒文化中，形象绝不能等同于单纯的、感官化的物质外壳，它总是伴随当前社会文化语境的持续更迭而不断地滋长、蔓延、流变，并逐步激发了诸如愤怒、惶恐、悲悯、鄙夷、狂喜等形形色色的情绪和感受；同时，形象的存在，又使上述情感得到了某种视像化、戏剧性的演绎和凸显，使之再次以直观、生动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维度，从而间接推动了社会变迁的持续进行。可以说，正是形象和情感的复杂纠缠与相互指涉，为人们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开掘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契机。

第二，是草根传媒文化的语言符码及其传递的社会心态。语言，始终是人类生存中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仅保障了个体之间交流的有效性，

---

①（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视像，声音与狂热》，周宪编译《激进的美学锋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41页。

而且也提供了“我们对自身的主观世界加以体验的枢纽”。<sup>①</sup> 在草根传媒文化中,无疑包含着大量的视觉语言符码,包含着一整套既定的表述程式和话语体系。不难发现,草根传媒文化的视觉语言具有强烈的当下性、突发性、质朴性和非专业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主流传媒文化中五花八门的修饰、点缀和渲染,并给人以异乎寻常的感官震撼和视觉冲击。然而,草根传媒文化又绝非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它在不断增殖与弥散的过程中,同样受到了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与牵制,同样经历了更加隐晦而复杂的调整、转换和加工。于是,在草根媒介貌似中立、透明的语言表述中,依旧潜藏着诸多蓄意为之的暗示、煽动和诱导,如尖锐的、难以调和的“二元对立”模式,令人感同身受的母题或原型意象,以及富有挑逗性和感染力的“戏剧性瞬间”,等等。上述视觉策略往往作用于公民在特定情境下的身份意识与群体认同,不仅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和普遍的精神共鸣,而且变相实现了对某种共同体意识的聚合与重构。这一点在围绕各色“最牛钉子户”的草根报道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概而言之,草根传媒文化的语言符码并不是一串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能指的序列,而是使人们从中感受到明确的倾向性和鲜明的价值判断,并由此而触及那更为深沉、厚重,更加发人深省的社会文化心态。<sup>②</sup> 可以断言,针对草根传媒文化及其视觉语言的细致分析,必将为习惯跟从西方而时常陷入“偏见”与“误读”的中国文化研究带来更为开阔的视野。

第三,是草根传媒文化的存在方式及其引发的公众参与。如前所述,互联网的一个鲜明标志在于高度的可参与性。以此类推,植根于网络空间的草根传媒文化也将呈现面向广大公众开放的独特形态。无可否认,主流传媒文化所贯彻的是一对多的单向度传播模式,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必须遵循预先设定的规划或程式(如报纸版面或电视节目表)而加以被动的、“照单全收”式的接受。那么,草根媒介的兴起则极大地改变了这样的局

① Cristina Lafont,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p. x.

② 在这里,有必要对社会心态和前文提到的情感做出一定的辨析。很明显,二者都涉及主体的某种心理反应、状况或趋向,并呈现相互渗透、彼此促发的内在关联。但必须承认,情感是一种更加感性化、个体化的心理活动,它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偶然性、短暂性和随意性;而社会心态则是人们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所共享的感知、经验和情绪的集合体,意味着普罗大众在长期的实践中所逐步形成的心理积淀和文化诉求,因而也表现了更加完整、统一,更具稳定性和普适性的基本面貌。

面。依托网络这一自由、开放、便捷、广阔平台，大众一方面获得了更多“登台亮相”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能够利用俯拾即是的技术设备，依凭自己的意愿对相关视觉文本做出形形色色的加工、重组与塑造，并由此而传达出某种自下而上的、充满挑战性和颠覆性的精神气质。如此一来，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之间明晰可辨的身份定位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传统意义上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公众这才真正获得了自我言说、自我演绎、自我彰显的有效平台。<sup>①</sup> 在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杭州“70码事件”、广东“小悦悦事件”、西安“药家鑫激情杀人案”、重庆“雷政富不雅视频门”等网络热点事件中，公众正是通过对相关影像素材的转发、评论乃至“二度创制”而进入了过去遥不可及的舆论的中心，不仅能够围绕某些社会公共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还有机会将个体的意志凝聚为一股无可阻遏的群体的力量，从而直接影响到相关政策法规的制订、调整与实施。那么，草根传媒是否能真正捍卫公民表达的权利和自由，进而营造一个开放、民主、平等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毋庸置疑，对以上问题的追问必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草根传媒文化的开掘、理解和把握。

第四，是草根传媒文化的内在悖论及其导致的伦理困境。草根传媒文化所具有的是多元、驳杂、矛盾与两歧性的构造方式，它既充溢着激进的政治文化诉求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无可避免地隐含着诸多悖谬、裂隙和症候，从而为人们窥探其深层次的脆弱提供了可能。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草根传媒文化在伦理学意义上的缺陷乃至困境。在传统道德准则濒临瓦解的社会转型阶段，草根传媒文化发挥了弥合与补充的重要作用，它一方面将种种不堪入目的社会阴暗面曝光于公众的视域之中，另一方面又充分调动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参与意识，从而发挥了维护正义、揭穿黑幕、声援弱者等重要的社会效用，维护了岌岌可危的伦理道德底线。然而，在草根传媒文化中，同样裹挟着大量的反伦理因素。首先，草根传媒文化对规范与秩序淡漠，很可能使公众本身所具有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特质得到几何级数的扩张，从而形成某种歇斯底里式的多数人的暴政，甚至对个体的私人生活构成严重的威胁与戕害。其次，在草根传媒文化这片无拘无束的疆域，大量色情、暴力、丑怪的视觉文本铺天盖地、大肆蔓延，在迎合

<sup>①</sup> 在一次以南京市民为主体的问卷调查中，有75.4%的受访者对草根传媒文化在促进表达自由上的有效性持赞同态度，远远多于持不赞同态度者所占的17.2%。庞弘《当代中国“草根传媒文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

人们隐晦而不可告人的“窥视癖”的同时，也很容易造成公众审美趣味的畸变与扭曲，并导致整个社会在道德水准方面的大幅度滑坡。最后，在草根传媒文化中，个体还常常陷入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状态：依托虚拟的网络空间，不少人化身为“键盘侠”，针对现实问题夸夸其谈、大放厥词；一旦回归坚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言论则往往沦落为一种空泛的、自恋式的宣泄，永远也无法付诸行动。因此，如何对草根传媒文化加以行之有效的引导与调控，从而在最大限度上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无疑成了当代媒介文化研究中不容错过的焦点。

当然，还必须强调的是，以上几个问题并非自说自话式的孤立存在，它们共同发生于一个“视觉文化转向”的宏观语境中，并不约而同地牵涉到形象、表征、观看、视觉建构这些视觉文化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概念和范畴。的确，草根传媒文化一方面作为社会变迁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视域；另一方面也依凭强烈、鲜明的视觉姿态，毫无保留地传达出了公民在当下最普遍的欣悦、彷徨、创痛与想往，不仅为现今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补充了新鲜的血液，而且环环相扣地勾勒了一幅动态的、充满魅力和可能性的新兴文化景观。正因为如此，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切入对草根传媒文化的分析和探讨，无疑有助于研究者穿透扑朔迷离的现象层面而发掘出更加深刻的价值与意义，发掘出社会变迁中每一个普通男女最真挚的情感期待和文化诉求。